

## 【论 文】

# 以不同方式唤醒民众的国家意识

——追记安健和他的《劝滇蜀桂黔诸土司文》<sup>1</sup>

秦 亮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华民族面临着严重的边疆危机，一些地区的少数民族上层基于自身狭隘利益，以帝国主义为靠山，大肆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出身于贵州土司家庭的早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安健，于1911年9月在《民立报》上发表了《劝滇蜀桂黔诸土司文》，针对滇蜀桂黔4省土司中出现的“五惑三谬见”，逐一进行分析、批驳，在一定程度上厘清了土司同胞心中的疑惑，纠正了他们的错误想法，从而增强了少数民族上层的国家认同。

### 解析“五惑”，明辨“三谬见”

由安健撰写的《劝滇蜀桂黔诸土司文》最初连载于《民立报》1911年9月初，后又转载于《东方杂志》1911年第8卷第7号内外时报，标题改为《贵州南龙桥土司安健劝滇蜀桂黔诸土司文》。

文章的诞生正如安健在文中所写的那样，此时“竟有如近日轰传云，我四省土司同胞，将联合乞保护于法国，以抗清廷改土归流之政策者遍载各报”，因此，安健撰写此文，警告他们这是“将先代数千年之禋祀、子孙无穷之富贵孤注一掷，不忍小忿而陷大恶，速全国分崩离析之祸”，并出于劝诫挽救诸土司同胞的本意，对“五惑三谬见”予以层层剖析，逐条驳斥。

在文章中，安健将存在于土司心目中的“五惑”归纳为：土汉之成见、主客之臆断、种族革命之错信、官吏之凌暴、自身之不能自存活，几乎有日趋衰亡之势。他先是从中华民族演进发展的历史脉络，揭示出少数民族与汉族同源而生，皆为“黄帝尧舜之子孙”，而一些土司同胞“自惑于诸不经之谈，不识古昔人种移殖之原，妄存畛域，自生隔阂，翹然立异于匪寇婚媾之汉族，牢守不破”。安健又指出土司“世受国恩，……不耕而食，不织而衣，襦裸之中，便邀爵命，除今帝室天潢之亲，及古圣先贤与夫勋臣之胤外，即当屈指吾侪”，清廷改土归流是为了“统一事权”和避免“强邻迫处易起纷争”，从而“设流官使责成有归，正所以保全吾等”，并非土司主观臆断的“夺我恒产，令陷饥寒”，“贪我所有哉”。最后，安健严厉指出，一些土司同胞“不知稼穡之艰难，……以有限之蓄积，供无底止之挥霍”，这些人“生活既穷，又习惯骄惰”，却“一腔悲忿，不思所以致此之由，……而迁怒于乘势剥削我之客族”。

随后，安健又批判了土司心目中的“三谬见”：第一，“中国必不可救药，不如舍旧谋新”。某些土司“眼光渺小，……而不免有厌中国之心”，以为中国遭“强邻相压，便被并吞”，未料到“中国四千余年文明之历史，四万万余伟大之民族，果众志成城，牛虽瘠加于豚上，胜败之数，岂云未可逆睹耶”？第二，“外人招徕如恐不及，必不夺我世守之地”。“暂种之骄戾，无复人理，其最甚者，厥惟对待异教之人”，如果土司同胞“乞哀求纳于异言异服之殊族……倾心归附”，也难免给帝国主义者留下朝秦暮楚、投机钻营、气节败坏的嫌疑，结果不仅求福不成，反而会招致灭顶之灾。第三，“有所凭借，积不能相容之宿怨，可以报复”。“土司与官吏及客族之相齟齬，咎岂尽在人”，土司“以其祖父之余荫，爵位世承，采地连阡陌，不能躬为民望，乃斤斤与细民事雀角鼠牙之争，已属非是”，却“食其食而不事其事，既辜清廷期望之心”。今日“更伺

<sup>1</sup> 本文原刊载于《中国民族报》2009年11月27日第7版。



隙求逞，藉势以相抗，躬蹈叛亡”，他们这种行为“对于清廷为不顺……对于祖宗为不孝”，已经是“首祸肇殃，诸恶咸具”，还有何颜面谈“可以报复”。

###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下的土司阶层

鸦片战争导致中国国门洞开，从此陷入“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的民族危机。除了武装侵略外，各列强还挑拨边疆少数民族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在僧俗官吏和土司贵族中间收买民族败类，培植亲帝分子。在外患紧逼、边疆告急之时，清中央政府及各边疆大吏筹谋边疆稳固，清末新政应运而生，边疆地区的“改土归流”也是其实行的一项具体措施。“改土归流”为的是强化国家对民族地区的控制能力，目标在于巩固国防。国家权力在改土归流中得以强化，进而对抵御外侮产生积极的作用。

外国资本主义军事、经济的入侵，不仅对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引发了土司阶层民族文化心理的嬗变。一方面是外国政治经济势力的侵略，促使边疆少数民族自身的传统经济结构逐步解体，加剧了土司阶层的入不敷出。另一方面，清末改土归流是清朝中央政府逐步将边疆地区纳入到国家的统一行政建制中，并尝试将权力向基层社会延伸的一次努力。此举必然触及到土司阶层的个人利益，从而触发激烈的矛盾冲突。如此，土司阶层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都遭到了极大的削弱，必然会认为这是其他民族压制自己所导致的结果，从而对抗清廷改土归流的政策。1905年4月5日下午，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及随员50余人在巴塘被杀，造成了中国近代史上震惊中外的“巴塘事变”。凤全作为驻藏帮办大臣经营川边地区，推行新政，激怒了该地的少数民族上层既得利益集团，以致被当地土司喇嘛杀害，这是当时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清政府为了保持国土的完整，在国家主权观念下加强对民族地区的统治，如清末新政、改土归流等政策的实施，都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但是在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对于个人利益的最可能既得者——民族上层来说，很难做到舍弃个人利益而维护国家利益，从而导致国家利益与少数个人或集团利益、大局与小局之间的强烈冲突与碰撞。那么，土司阶层“悻悻然怒清政府之抚御失策”，出现“将联合乞保护于法国，以抗清廷改土归流之政策”的情形也就不奇怪了。

内忧外患之际，民族上层人物成为本民族的精神领袖，他们的导向是引导民众跟从的最大力量，其间民族上层人物的动摇，抑或是蜕变为民族分裂主义者，都与他们在跟外国入侵者的接触中，受西方尤其是英法等国民族主义的影响有关，因此增强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的国家归属感和忠诚感至关重要。安健在《劝滇蜀桂黔诸土司文》中认为，土司与汉族“同化有年，宗教语言，起居服食，都无差别”，都是“黄帝尧舜之子孙”。土司于中华大地之内，经过数千年的繁衍生息、融合交流，已在情感上或者信念上与汉族或其他少数民族连接为一体。安健在《劝滇蜀桂黔诸土司文》中还大量使用了《尚书》、《礼记》、《周易》、《左传》、《国语》、《论语》、《孟子》、《墨子》、《列子》、《晏子春秋》、《诗经》、《汉书》、《后汉书》、《世说新语》等中华传统文化古籍的精彩典故，辅之以济火、秦良玉和奢香夫人等效忠国家的事迹，循循善诱、因势利导，规劝土司同胞秉持忠孝大义，坚守国家认同。其实，华夏文化从诞生之日起，就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少数民族“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中华文化不是某一个地区，也不是某个族类的专利，而是中华大地上各地区、各族类相互影响、相互吸纳，共同积累而成的一个整体。中华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吸纳、不断融合、不断扩大、不断更新，具有稳定的连续性。数千年来尽管王朝更迭，世事变迁，中华文化不仅没有中断，反而不断延续、更加丰富、日益繁盛，因此，加强中华文化认同，构筑各民族的同心圆，有利于夯实中华大家庭的民族基础，有利于增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有利于提升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从而能够有效地抵御外敌，巩固边疆，维护国家统一。这其实也是国家认同自身的应有之义。



## “土人安健，文章震惊海内”

《劝滇蜀桂黔诸土司文》的成文首先与安健特殊的家庭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安健先世为水西土司，其族祖是明代著名女政治家奢香夫人。在明朝洪武初年，奢香夫人为稳定贵州局势，沟通内地与边疆的经济文化交流，起了积极的作用，是我国西南各族人民中的杰出人物。安健青少年时期就经常听父辈讲述奢香夫人的轶事，他三哥还常将亲身经历的1883年中法战争中的所见所闻讲给他听，使安健对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尤为愤慨。面对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他满怀救国救民的理想，于1905年5月东渡日本并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同年8月20日，安健在日本东京首批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在当时入盟的西南会员中，仅安健一人是少数民族”。辛亥革命前，他多次被派到贵州、云南、广西等地从事革命活动，曾先后参加过孙中山亲自策划和组织的钦廉之役、河口起义、广州起义等。同时，安健还在当时的日本、上海、广州等地的进步报刊上发表文章，宣传革命，鼓吹共和。当时上海报刊称，“土人安健，文章震惊海内”。

旅日期间，安健住在中国留学生聚居的神田区，这里也是孙中山在日本宣传革命的中心地区之一。安健在此处考察到“彼都人士之纳身轨物，各安其生，各遂其性，益恍然吾国衰弱之所由然”。即便是同为豪门贵族阶层，也有贫富悬殊之别，然“两者之间”，却“各安其分定，从不闻有纷争诟谮之事”；王室显族的子弟到了上学的年龄，与平民百姓的孩子一起在学校学习，“不闻有骄淫矜夸敢自放废者”；掌握权力的豪爵也要如律纳税，而“不敢自外于法”。安健认为这些都应“为吾土司诸同胞矜式”。

安健作为贵州安顺郎岱厅属的南龙桥土司，又是东渡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者，特殊的身份使他既熟悉少数民族上层——土司阶层的一切情况，又了解新兴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传统儒家教育的熏陶和先进的资产阶级建国理论，使他的国家意识愈发强烈，国家主权意识也愈益浓厚，对于边疆价值的认识也愈趋深刻。特别是在列强入侵时，安健的救亡意识进一步加强，他将自己掌握的民族国家思想，向身处列强包围之中的边疆少数民族同胞进行宣传，启迪他们的国家观念，树立他们的国家意识，培养他们“爱国御侮”的精神，从而达到增强国家认同的目的。

国内各少数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是抵抗侵略的主要思想基础，它是在抗击侵略的过程中形成的。这尤其表现在居住于边疆的少数民族，“在外国势力入侵时，国家各阶层以不同的方式唤醒民众的国家意识，投入到保家卫国运动的宣传中”，边疆民族的向心力因而得到进一步加强。安健以自己在国外的切身感受，披肝沥胆、推心置腹，解析“五惑”，明辨“三谬见”，厘清了土司同胞心中的疑惑，纠正了他们错误的想法，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少数民族上层的国家认同。

### 【延伸阅读】

安健（1877年～1929年），字舜卿，彝族，郎岱厅羊场巡检司凹乌底（今贵州六盘水市六枝特区新场区上官乡下官寨）人。少时就读于安顺府（今安顺市），中秀才，游学贵阳，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影响，酝酿反清。于1905年东渡日本，参加中国同盟会。回国后参加河口、广州等地反清起义。辛亥革命后，支持孙中山筹建国民党。讨袁护法战争时，被推为讨袁军贵州司令长官。1918年，任中华革命党贵州支部长。继任川边宣抚使后，赴四川大凉山、甘孜、理塘等少数民族地区，宣传孙中山五族共和、团结救国的革命思想。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主张。北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坚持国共合作，反对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后遭国民党右派打击并受通缉，被迫出走云南。1929年10月，病逝于昆明，由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上将。主要著作有《讨清檄文》、《贵州土司现状》、《贵州民族概略》等。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邮编：100871

本期责任编辑：马戎、于长江

电子邮件：[marong@pku.edu.cn](mailto:marong@pku.edu.cn)

